

焦點評論

方靖之

暴徒的「三罷暴亂」，先後演變成中大和理大的攻防戰。暴徒非法霸佔校園，搶奪大學內的危險化學物品，大量製造大殺傷力武器，嚴重堵塞吐露港公路和紅隧的交通。為阻礙警方執法，暴徒更一改流寇式的破壞，反過來佔據中大及理大校園防守，與警方展開激烈的攻防戰。在戰況激烈之時，暴徒差不多將中大和理大校園都燒成火海，連理大周邊的天橋亦烽火連天，暴徒更以海量的汽油彈以至利箭襲擊警員，有警員因而受重傷。這些都說明暴徒已經接近瘋狂，失去常性，企圖在大學校園製造一場嚴重傷亡事件，為這場注定失敗收場的暴亂續命。

不過，暴徒的癡狂行徑卻遭到警方的鐵腕遏制。與以往的清場驅散不同，警方在中大和理大之役上，明顯採用了更靈活的手段、更多變的戰術、更有力的鎮暴，對暴徒作出了沉重的打擊。在中大一役，

警方針對二號橋進行持續有力的清場，保障了吐露港公路安全。及後暴徒佔據中大防守，警方則採取全面包圍、圍而不攻策略，將暴徒圍困於中大校園，最終令暴徒與中大學生會之間爆發嚴重內訌，雙方不歡而散，部分暴徒撤離，加上衛生、物資等問題，暴徒紛紛逃逸，警隊兵不血刃地解決中大之圍，恢復了吐露港公路行車，在沒有作出任何讓步下，重創了暴徒氣焰。

中大防守戰以及「三罷」的失敗，令暴徒惱羞成怒，隨即開拓另一條戰線，先是破壞紅隧設施，再佔據理大校園，重演升級版的中大攻防戰。警方在理大的清場行動上，進行了大包圍、大圍捕。先後多次要求暴徒棄械離開，在不獲暴徒理會後，警方隨即進行了全面的封鎖包圍，封死理大各個出口，不讓任何人離開及接近，囊中捉鱉，將最精銳的幾百名核心暴徒，以及一班暴徒支持者團團圍困於理大。

暴徒為了脫困，瘋狂地用各種致命武

器攻擊警員，還威脅要使用化學殺傷性武器。但警方都沒有退縮，並且強硬表明如果再繼續用汽油彈、弓箭、汽車或任何致命武器襲警，警方有可能選擇實彈還擊，震懾了暴徒。最終包圍戰大獲全勝，成功將大批暴徒精銳繩之於法。打了一場五個多月暴亂以來的大勝仗，大大振奮了社會的制暴士氣，也令暴徒膽寒，在暴徒集中營「連登討論區」更是一片哀號。他們估不到警方認真起來，原來他們根本不堪一擊，他們更估不到社會民意對暴亂的支持更是急劇下降，所謂發動二百萬人解救理大暴徒，更是笑話一場。

用選票向「撐暴」政棍說不

理大一仗，顯示出警隊的新作風，香港社會不能再無止境地忍受暴亂，暴徒仍然拒絕收手，並且將破壞不斷升級，草菅人命，燒殺搶視作平常；警方也沒有必要

再留手，暴徒用殺傷力武器，警方武力也應升級；暴徒到處破壞，警隊就圍而捕之，讓暴徒知道違法的後果，知道法治界線不容侵犯。暴徒的目的就是「攞炒」，講道理、尋和解不過是與虎謀皮，既然如此只有鐵腕鎮暴。全香港都沒有法外之地，暴徒逃到天涯海角都躲不過警方的追捕。只要警隊打出氣勢，暴徒將難有發圍機會。

事實上，警察的鐵腕打擊已經引起反對派陣營的恐慌。有反對派人士及媒體已直斥「防守理大」是錯誤策略；有反對派人士勸說暴徒收手，壹傳媒老闆黎智英重彈收兵選舉論。反對派政客雖然都有到理大聲援暴徒，但其實都是心不甘情不願，如果不是暴徒施壓說反對派不聲援就不投票，反對派政客怎會趟渾水，隨時惹禍上身。警隊的鐵腕鎮暴，將令反對派進一步分裂，不少反對派政客想的是選票、議席，而不是血雨腥風，現在他們就要摘取政治果實，怎會願意冒險？可惜不聲援，暴

徒票也泡湯，唯有出來做場政治騷，希望左右逢源。

中大及理大之役是這場暴亂的轉捩點，暴徒由於錯判形勢、作出了完全錯誤的戰略，導致在「三罷」及大學攻防戰上輸得一塌糊塗，不但損兵折將，民意戰更輸個清光，連帶反對派也受到拖累。暴亂的拐點已經出現，現在市民最需要做的是兩件事：

一是全力、無條件的支持警隊鐵腕鎮暴。警隊大力平亂，必定會出現一些較激烈的鏡頭和畫面，市民應明白這是不可避免，必須繼續支持，給警隊足夠的底氣。

二是要以一票止亂。反對派至今之所以拒絕與暴徒切割，為的不過是政治的利益、選舉的利益，要令反對派不要縱暴、煽暴，不能靠好言相勸，只能靠一票懲罰，讓反對派知道暴亂無市場，無着數，他們自然就會切割，從而令暴徒更加孤立，這樣平暴的曙光很快就會看到。

資深評論員

議事論事

聞昱行

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和林雲浩，前日就「泛民」議員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引用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》（「緊急法」）制定《禁止蒙面規例》（「禁蒙面法」）的司法覆核案頒布書面判決。裁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「危害公安」的情況下引用「緊急法」不符基本法規定；由此制定的「禁蒙面法」，對基本權利的限制超乎合理需要，不符合相稱性驗證標準，故裁定「違憲」。裁判一出，立即引來社會各界嘩然，警方即時開始暫停就「禁蒙面法」的執法。

筆者尊重法庭裁決，也認為這正好顯示香港司法獨立，但同時認為這個裁決存在很大問題，律政司絕對應該提出上訴。

首先，香港的法律系統，依據其制定的時間分為兩類，在回歸前制定的，和在回歸後制定。這兩類法律的「可審核違憲性」（即香港法院是否有權審核其違憲與否）完全不同。

根據基本法第8條：「香港原有法律，即普通法、衡平法、條例、附屬立法和習慣法，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，予以保留。」這裏的「香港原有法律」就是指回歸前的法律。

可見，香港的原有法律，法理上在回歸時已被審核過是否抵觸基本法，如果沒有做出修改，即表明不抵觸基本法，這樣才「予以保留」。

1997年2月23日，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作出《關於根據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〉第一百六十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》，已經將「緊急法」採納為香港特區的法律。

事實上，臨時立法會在回歸之初，也

對所有抵觸基本法的法律條文進行修改，當時「緊急法」同樣通過適應化修訂。

雖然在有關「緊急法」的適應化修訂中，這次基本上只是把原版本上的「總督」和「行政局」，相應地轉換為「行政長官」和「行政會議」。但不能以此認為修訂是倉促的。因為立法會的適應化修訂長達兩年左右，對所有法例逐一審核。有關「緊急法」的修訂在1999年第71號第3條中。這時香港已回歸兩年，參與修訂的立法會議員顯然沒有處於時間壓力下而馬虎行事。由於這個修訂有追溯力，故顯示的法律條文的版本還是1997年7月1日的版本。因此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香港立法會的修訂已足以證明，修改後的「緊急法」符合基本法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根據基本法，法院根本無權審核在香港回歸前已制定的、又通過立法機關修改後決定予以保留的法律。而「緊急法」正在此列。

當然，法庭審核「禁蒙面法」是否違憲，這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引用「緊急法」賦予的權力制定「禁蒙面法」並不矛盾。正如基本法規定，立法會有權制定法律，但法庭也有權通過司法覆核，審核其是否違反基本法一樣。不能說法庭認為「禁蒙面法」違憲，就認為引用「緊急法」是錯的。這是兩回事。

其次，有人認為，「緊急法」在1922年制定，但在1991年，香港已經通過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（「人權法」），故此兩條法例不兼容。

對這個質疑，除了筆者上述分析之外，還可以從修訂的歷史中予以駁斥。「人權法」是1991年制定的，1993年香港立法局修改了一系列涉及刑事罪行的相關條例，旨在保障香港人權。這一系列條例包

括《侵害人身罪條例》、《監獄條例》、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、《刑事罪行條例》、《長期監禁刑罰覆核條例》、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》和《陪審員條例》等。「緊急法」正是在這一波修改法律中修訂了罰則。顯而易見，當時社會在「人權法」通過之後，為了適應「人權法」的要求而做出的修訂。故此，修訂後的「緊急法」，不存在和「人權法」不兼容的問題。

再者在1995年，立法局又再次修訂被指與「人權法」相抵觸的法律，包括《公安條例》等。這次由「民主派」主導的修訂，並沒有包括「緊急法」。這再次說明，當時的「民主派」並不認為（修訂過的）「緊急法」不滿足「人權法」的要求。

第三，在法官判決中，認為特首引用「緊急法」有兩個條件，一個是「緊急情況」、另一個是「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」。其中，法官認為在「危害公共安全」的情況下訂立規例，不符合基本法，對「緊急情況」是否違憲，則不予裁斷。

如筆者以上分析，這裏的關鍵問題，不是法官最終裁定「緊急法」整體或其中一部分是否「違憲」的問題，而是從一開始，法官就沒有這樣的權力覆核「緊急法」的違憲與否，法庭接受司法覆核中的這個部分根本就是錯的。政府律師抗辯時沒有把法院無權審核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，這是一個失誤，也可以在上訴時候使用這個理據。

法官把「緊急情況」和「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」相區分和對立，這也是錯的。「緊急法」規定「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。」這裏確實列舉了「緊急情況」和「危害公安的情況」兩種情況。

法官之所以沒有裁決「緊急情況」，大概是因為基本法第56條規定「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、向立法會提交法案、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，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，但人事任免、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採取的措施除外。」有了這個「緊急情況」的字眼，法官感覺不好裁定其違反基本法，於是「放過」了「緊急情況」一馬。

可是，「緊急情況」和「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」不是截然對立的，「危害公安的情況」正是現時「緊急情況」中的一種。誰能說，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現行事件，就不是緊急的？

因此，「緊急法」中的「或」字，不應該理解為兩種並列的、非此即彼的、沒有交集的情況，而應該按照文字的實際意思，理解為兩種有交集但不完全相同的情況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硬要「抓字蝨」認為基本法沒有「危害公安」的字眼，而裁決「危害公安的情況」下運用「緊急法」是完全錯誤。

事實上，法官認定，政府制定「禁蒙面法」的出發點和引用「緊急法」的依據為「危害公安的情況」，只是由於在政府新聞稿和刊憲時，有「經過逾18星期的激烈示威活動，令香港出現了嚴重公共危險的情況」的引言。在「禁蒙面法」中並無相關字眼。這些一般性的引言是否能論證政府的出發點沒有因為「緊急情況」呢？如果政府提出修改網站上的引言，把其改為「令香港出現了嚴重公共危險的『緊急』情況」，這是否又可以被法官視為「合憲」呢？

如果法官在香港這個危急關頭，依然執著這些小字眼，令人失望。

第四，法官又裁定，「禁蒙面法」不

能視為一個「附屬法例」，質疑特首沒有權力制定「禁蒙面法」。所謂「附屬法例」，根據立法會資料，是「指根據或憑藉任何條例訂立並具有立法效力的文告、規則、規例、命令、決議、公告、法院規則、附例或其他文書。該等法例均須獲立法會通過。通過的程序有兩種：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，或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」

規例屬於「附屬法例」的一種，政府制定規例時可以「先訂立後審議」，這正是現在政府的做法。雖然通常情況下，「附屬法例通常是由政府制定的詳細規則及規例，為實施某條例而須訂立的技術或程序上的細節。」法官據此認為「禁蒙面法」不能視為一個「附屬法例」，繼而認為特首沒有先制定再審議的權力。

但這種「通常」的情況並不排除特殊情況。在「緊急法」中賦予特首廣泛的權力制定影響很大的規例，以應對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，如果說這種規例只能限於「技術或程序上的細節」，這根本與「緊急法」的規定完全不符，也不符「緊急法」制定的原意。再者，「緊急法」是成文法，法律地位在「附屬法例」的定義這種約定俗成的習慣法之上。

第五，至於「禁蒙面法」本身，對基本權利的限制超乎合理需要，這點仁見智。或許「禁蒙面法」的一些細則可以修改，比如給一些場合蒙面（如萬聖節）以合理辯解或豁免的權利。這些並無不可。但以此否定「禁蒙面法」是完全錯誤的。

事實證明，「禁蒙面法」在降低暴亂參與人數方面有積極的作用。如果貿然廢除「禁蒙面法」，只會給社會秩序造成更大的衝擊。政府應該上訴，而且也不應排除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釋法權的可能性。

資深評論員

讀懂「中國特色」——四中全會隨想之四

環顧今日世界，能夠把握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目標，一張藍圖繪到底，一屆接着一屆幹的執政黨，唯有中國共產黨。

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。因為有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，總攬全局，協調各方，保證了國家治理的穩定與可持續。西方的多黨制、輪流坐莊、三權分立，並不是唯一的民主政治模式，也不是放之四海的真理。國情千差萬別，治理模式不能也不應該只有一種，好比不同大小的腳要穿不同尺碼的鞋。中國走自己的治理道路，一黨執政，多黨合作，注重協商民主，符合中國的實際和快速發展的需要，創造了國家治理的一種新模式，這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。

《決定》概括了13條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，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獨特性。比如全國一盤棋，集中力量辦大事；比如公有制為主體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；比如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、價值理念，促進全體人民團結在

一起；比如以人民為中心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，等等。《決定》的目的和效用，就是通過頂層設計，推進這些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，為實現中國夢保駕護航。

國圖吞棗地照搬他國的制度和治理模式，鮮有成功的例子。中國共產黨很早就懂得了這個道理，因而特別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，實事求是。當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就沒有照搬俄共的「城市中心論」，而是獨闢蹊徑，「農村包圍城市」，最終奪取全國政權。《決定》提出的制度建設目標和工作部署，每一項都緊扣國情，洋溢着鮮明的中國特色。

中國就是中國，我們樂於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，但最終要「本土化」「中國化」。同時我們不會丟棄自己的優勢，而是融會貫通，不斷光大這種優勢。《決定》向全世界再次表明，中國不會走封閉僵化的老路，更不會走改旗易幟的邪路。

註：本文英文版原文刊登於《中國日報香港版》評論版

特約評論員

法工委撥亂反正 捍衛特區法治

有話要說 溫滔森

早前，反對派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，要求法庭審查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》（「緊急法」）及《禁止蒙面規例》（「禁蒙面法」）有否違反基本法。及後，法院周一作出裁決，裁定「緊急法」及「禁蒙面法」違反基本法。昨日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發表談話，指出高院的有關裁決「嚴重削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應有的管治權，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」。

法工委的談話發表後，反對派自然一如外界所料，立即跳出來抨擊。有意見認為，法工委的談話等同否定了香港法院的裁決，干預香港的司法獨立，以及剝奪了基本法第158條賦予香港法院的部分釋法權云云。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則聲稱，人大常委會釋法是一個政治行為，法工委的談話是「破壞香港法治，想將香港法院廢武功，質疑是否法官不可用基本法作為法律基礎審查」云云。

不諱言的說，梁家傑及反對派的言論

，實在是混淆視聽。首先，法工委的談話，根本跟人大常委會釋法沒直接關係，亦沒剝奪法院擁有的基本法部分解釋權。簡而言之，法工委今次的談話，主旨共有兩個：一是誰有權判斷和決定某條香港特區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問題，即是坊間俗稱的「違憲審查權」；二是「緊急法」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問題。法工委發言人表示，「緊急法」符合基本法，實在有其法理基礎，那便是基本法第160條。

根據基本法第160條規定：「香港特區成立時，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為同本法抵觸者外，採用為香港特區法律」。為此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97年2月23日，作出《關於根據〈中國香港特區基本法〉第160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》（《決定》），列明了哪些香港原有法律及原有法律的部分條款，將在回歸後不再採用，以及述明了香港原有法律中的名稱或詞句在解釋或適用時，一般須遵循的替換原則。

法工委的談話只是述明了上述客觀事實，證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已作出《決定》，「緊急法」不在《決定》的附表之內，並在回歸後作出了適應化修訂，這是「

緊急法」符合基本法的法理基礎。《決定》乃是根據基本法第160條所作出的憲制性規定，高院的裁決卻無視上述《決定》，究竟是誰才是「破壞香港法治」？

說到這裏或者有人會說，《決定》當時沒發現「緊急法」「違憲」，不代表日後不能發現「緊急法」或法例的部分條款「違憲」吧？這個問題，基本法第160條亦有提及「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抵觸，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」。在整條第160條裏，根本沒提及香港法院或其他機關，所以條文中那一句「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抵觸」，其主語必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。

正因如此，法工委強調「香港特區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，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，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定」。香港法院在沒有任何法理基礎之下，就「緊急法」及「禁蒙面法」展開所謂的「違憲審查」，才是真正違反基本法第160條的行為。換言之，梁家傑所言的「將香港法院廢武功」，只不過是法院過住一直越俎代庖，法工委今次的談話，只不過是撥亂反正而已。

時事評論員